

# 機械時代的意義黏著劑

## 劉瀚之〈揪領器〉等作品與世界邊界之推移問題

### Adhering Meanings in a Mechanical Age

#### Liu Han-Chih's *The Collar Seizing Device* and the Issue of Shifting Borders

文 | 王柏偉 Wang Po-Wei

【我主張】在界線的混淆中尋求歡愉，同時對界線的建構負起責任。

—Donna J. Haraway

#### 藉由媒介物的轉換來改變行為機制

今年獲得「臺北美術獎」首獎的〈揪領器〉、〈翻書器〉、〈窗外〉、〈鬆垮矯正器〉與〈步行閱讀留言機〉這幾件作品是一些機械性的裝置<sup>1</sup>。正如展場中與機械裝置作品一同提供的漫畫圖示或錄像記錄所指示的，這些機械裝置並非不與其他的機械連動而成為總體工業系統的一個環節，而是安插到人與自身（〈翻書器〉、〈窗外〉）或人與他人（〈揪領器〉、〈鬆垮矯正器〉、〈步行閱讀留言機〉）這種社會層面意義上的互動關係之中，企圖藉由改變媒介物的方式，轉換日常生活中我們習以為常的肢體行為與思考方式。

〈揪領器〉轉化了暴力使用者的力量使用機制。將「揪領」這種以上對下、極具象徵性的動作，放低到腰部的位置。原本揪領的動作意在將低矮弱勢者衣領（實為「頭部」）移開弱勢者具有自主性的地點，拉高貼近暴力使用者所佔有的象徵性空間。然而，〈揪領器〉以「旋轉把手」這種相對間接的費力動作，在空間與時間兩個層面上同時將拉開「暴力使用者的象徵位置/暴力使用者力氣使用位置」之間的距離。這樣的距離弱化了暴力使用的立即性與直接性，讓「暴力使用者」藉以實現自身象徵的「暴力」這種媒介大幅喪失「讓象徵物道成肉身」

的力道，甚至藉由這樣的距離凸顯只有象徵物卻無暴力這種有效媒介來轉化時，象徵物自身的無力感。類似於〈揪領器〉在「象徵/暴力」兩者間拉開距離的企圖，〈步行閱讀留言機〉所創造的是閱讀留言所需的時間距離，依賴這種時間距離進一步可能回頭影響訊息留言者與訊息閱讀者兩者間原本可能較為緊密的「互動」距離與互動密度。除了將機械裝置安插到人與人之間，劉瀚之還處理了內化了社會期待。〈鬆垮矯正器〉所拉開的是「符合某些社會期待/自願性」兩者之間的距離，其透過機械所顯示出的意念是：雖被迫符合機敏（鬆垮的對立面）這種社會期待卻無意積極反抗。〈翻書器〉與〈窗外〉兩件作品雖然也下錨於「期待」層面，但是更為貼近被內化了的自我期待。〈翻書器〉在「認真讀書/偷閒」兩者間創造距離。我們都知道全心灌注於書本之中其實會大幅讓人忽略外在條件的不舒適。不管有意無意，本作品機械裝置所翻之〈純粹力動現象學〉以其術語上的抽象性與實體上 1075 頁之厚度，無疑地讓期待與實際執行之間有了「繼續讀或不讀？」的距離，這是〈翻書器〉得以出現的心理距離。不同於〈翻書器〉在心理上依賴某本抽象度極高的書所創造出來的限制及逃逸這種限制的企圖，〈窗外〉更進一步地創造了某個能夠提供逃逸的「框架（窗框）」：我們甚至不再需要自行以想像建構一個世界，只要有「框」，就實現一個能夠區分內/外的世界，我們因而只要創造框（拉開窗框），而不必擔心該如何建構世界的內容。〈窗外〉所拉開的，是「作為世界的框架/填充內容的事件」兩者之間的距離。



▲ 首獎得主劉瀚之與其作品〈鬆垮矯正器〉，機械物件、輸出，30x10x80cm，2011



▲ 劉瀚之，〈步行距離留言機〉作品說明

如果說，上面的作品描述所指向的都是一種藉由媒介物的轉換來改變行為機制並「創造意念與實際位置兩者間距離」的做法，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做法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或許我們必須先在機械裝置的背景下思考這樣的問題。

### 世界圖像的機械化

Eduard Jan Dijksterhuis 曾經提到，我們活在一個以機械的方式（mechanical）來想像世界運行方式的時代，他稱之為「世界圖像的機械化」<sup>2</sup>。對他來說，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古代科學被牛頓（Isaac Newton）與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所代表的古典物理學所取代。在亞里士多德式科學中作為世界基本單元的實體（substance）以及由此而來必須依賴外因性力量來推動運動物理學，在十六與十七世紀失去了它們

解釋世界的效力，讓位給以函數（function）為基本的關係單元，以力為內因性力量的現代科學<sup>3</sup>。換句話說，這種機械化了的世界圖像表現在「力」這種機械論的單元與「函數」這種數學式的事件（事物）關係描述上。

這種對於現象的考察方式不只被用在自然現象上，也被全面性地拿來建構人文與社會科學。正如 Sybille Krämer 所揭示的<sup>4</sup>，對十七世紀的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來說，推論性思考是一種「象徵性機械（Symbolische Maschinen）」的運作方式，命題與命題間的關係乃是函數性的邏輯推演關係。更為顯而易見的例子，就在十七、十八世紀所出現的「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這個領域中，不管是蘇格蘭啟蒙學派還是法國的百科全書派，我們都能看到這種機械論式的人際關係考察<sup>5</sup>。這樣一種思考方式直接導致馬克思（Karl Marx）在十九世紀認為「生產關係」才是社會與人際關係的基本單元。

不僅因為工業革命導致人造物幾乎充滿我們日常生活周遭，更是因為在工業體制的不斷複製與擴大之下，社會大眾的生命節奏反而變成必須依照工廠與機械的節奏來加以安排。正式在這樣的基礎上，二十世紀初聖彼得堡的 Aleksej Kapitanovic Gastev 提到了「世界的技術化」，他認為，應該要做的事情並非藉由人去把機械組織起來未人類服務，相反地，應該藉由機械來促成整體社會與生產關係的改造，所以他說：「是機械在控制著活著的人。機械不再是被控制的對象，而是控制人的主體。」在這種思惟方式的主導下，對他來說，藝術就該是「組合藝術 (kombinirovannoe iskusstvo)」：「首先就是各種熟練的技能，有能力進行加工與整理、去選擇和調配適用於對方的東西、有能力進行組裝，以熟練的手法把無序與分散的東西整合成為機械結構，能為能動的對象」<sup>6</sup>。

就是在古典物理學→道德科學→組合藝術這三個歷史轉折事件共構下，我們建構了一個得以支撐並思考劉瀚之〈揪領器〉等作品的歷史脈絡。

### 建構的制度性 / 制度的建構性

對我們來說，從古典物理學所考察的自然、道德科學所在意的社會現象到組合藝術所在意的人與機械兩者間關係，都是〈揪領器〉等作品深植其中的、人類所建構出來的制度。正如 Bruno Latour 在談及自然、社會與工業或機械體制這些東西的時候所提及的，這些從現在看起來被設想為屬於「現代 (Modern)」時期的制度都是建構性的：自然是建構性的，社會是建構性的，工業與機械體制是建構性的，甚至連「現代」也是建構性的<sup>7</sup>。不過，雖然這些制度是建構性的，但是自認為是「現代人」的我們，不僅在信念上從未質疑過這些制度是否有什麼必須更必要的必要，甚至還複製並強化了這些制度施加在我們身上的力道：因為對無菌室嚮往而對某些被我們認為是不淨的弱勢族群施加暴力、為了呼應和諧社會的期待而不得不虛偽地與某些討厭的人緊密地互動、為了某些特殊的場合不得不打理好自己的門面來顯得機敏、為了前途不得不認真硬啃自己覺得無趣的書本、為了現實生活而不得不大幅放棄做白日夢的外逸時間。

▼ 劉瀚之，〈窗外〉，機械物件、輸出，40x25x55cm，2011





▲ 劉瀚之，〈翻書機〉，機械物件、輸出，90x50x90cm，2011



▲ 劉瀚之，作品展場空間局部

在網路所強力推進的個體化浪潮下，「現代制度之強烈期待 / 個體的低遵守意願」兩者間的裂縫急遽擴大。〈揪領器〉、〈步行閱讀留言機〉、〈鬆垮矯正器〉、〈翻書器〉、〈窗外〉這些機械裝置正是這樣一種「現代性機械」，它們一方面肯認了暴力、和諧社會的緊密互動、社會期待的自我內化這些「現代」制度的強制力，另一方面卻在「世界圖像之機械化」的脈絡下，不得不創造某些機器來縫合弱揪領、退縮式互動、機敏假象、認真錯覺與隨時可做白日夢這些逐漸擴大的裂縫。就此而言，我們見到藝術家豐沛的想像力，他所創造出來的機械裝置彷彿意義的強力黏著劑，牢牢地將本應分崩離析的「現代制度之強烈期待 / 個體的低遵守意願」這一矛盾又再一次地牢牢捆住。

當然，我們也能夠有嘗試某種非黏著劑式的設想：是否有可能鼓勵不同於現在制度的分裂與增殖，而不是在網路時代繼續堅持印刷術時代未能解決的中央控制方案？以 Donna Haraway 的說法，就是「透過無盡的分裂，追尋一種新的本質聯合」，換句話說，就是透過親近 (affinity) 形式的「結盟 (coalition)」取代「認同 (identity)」<sup>8</sup>，從創造機械協助解決「建構之制度性」在建構層面上的未竟之處，轉而專注於發明機械來強化「制度的建構性」並使文化多樣性得以大幅擴張。或許這是擁有豐富想像力的藝術家能夠思考的下一步。

(本文作者現為藝評人、德國 Witten / Herdecke 大學文化系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 註

- 1 除了〈翻書器〉之外，其他的幾件作品都不須配備電力。因為字數限制，所以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機械性」這個五件作品所共有的特徵，而忽略不同作品間彼此進一步的細緻差異。
- 2 Eduard Jan Dijksterhuis 著，張卜天譯，《世界圖景的機械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2010。
- 3 當然，我們在援引西洋科學史發展來處理台灣當代藝術現狀時必須考慮到科學、科技與文化在傳散與吸收的時候，不僅會有時間上的落差，也可能會有文化上的轉譯問題。不過對於「機械文明」的接受，在劉瀚之的作品中是看得出來的，因而我們在此由於篇幅與聚焦的限制，不欲偏航去討論機械文明傳散進程相關的歷史問題。
- 4 Sybille Krämer, *Berechenbare Vernunft: Kalkül Und Rationalismus Im 17. Jahrhunder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1.
- 5 更為清楚的說明請見 Thomas L. Hankins 著，任定成 / 張愛珍譯，《科學與啟蒙運動》，上海：復旦大學，2000，頁 163-197。
- 6 引文與更詳細的討論請參閱 Siegfried Zielinski, *Archäologie der Medien*, Hamburg: Rowohlt, 2002, p. 262-291.
- 7 關於制度的討論請見 Bruno Latour 著，劉鵬 / 安涅思譯，《我們從未現代過》，蘇州：蘇州大學，2010，頁 15-56。
- 8 更清楚的說明請參閱 Donna J. Haraway 著，張君玖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台北：群學，2010，頁 243-293。